

瑞安老房子系列之二

南堤街有座人文内涵丰富的株树楼

■万锡春

人文内涵丰富的南堤街

南堤街虽是一条西起会文里东至虹桥路，长约 190 余米的小街，却是一条具有丰富人文内涵的街区，瑞安项姓大多聚居在这里，项氏是名门望族，孝悌之家，代有闻人。过去在午堤桥建有会文坊，为宋时项公泽一门十八人登第奉敕而立。从清至民初，有项舜、项傅梅、项傅霖、项方纲、项芳兰、项湘藻，及反日爱国的“洋状元”项骥等人，闻名遐迩，誉满乡里。

街南原有一条小河，这条小河是瑞安历史上古县城内河道以三纵四横格局分布的四横之一午堤河（1981年午堤河被填拓宽为街道），这里街道

倚河而设，自成坊里，弄堂幽深，小桥流水，绿波荡漾，犹如一幅由石板路、河流、木楼、船舫、小桥等组合而成的画面，尽显江南水城风貌。项氏宅院就坐落在这风光秀丽的午堤河边，原项氏宅院规模宏大，南临午堤河，北靠所坦街，西接会文里，东至虹桥路，在这范围内以多个三合院或四合院为基本建筑形式，作纵向和横向进行组合，从而形成一个拥有多种组合形式的庞大宅院建筑组群。这种作为家族庭院建筑的组合模式，在当时瑞安城内也不多见。

据民国《瑞安县志》载，在项氏大宅院内有“水仙亭，

在草堂巷，清诗人项霁藏书处”；“耕读亭，在大隐庐街，清项傅梅得明姜立纲书‘耕读’二字，以榜所居之西”；“株树楼，在午堤，清项傅霖藏书处，楼以株树筑成故名”等等，这一座座都是具有曲折来历与文化内涵的楼台亭阁、雅屋精舍。这些故居旧屋，本身就是瑞安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政府接收，拆分给住房困难的群众，由于自然坍塌或改善居住条件而改建，以及后来城市建设的需要而拆建，目前的老宅所剩无几。株树楼是其中保留下来比较完整的一座二进合院式建筑。

株树楼系二进合院式传统建筑

株树楼位于市区玉海街道虹南社区南堤街 14 号，已不是过去得风望水的宅院，确切地说所在位置已经没有了昔日的古韵和门前流水的清秀。建筑东边铺设了一条城市主干道——虹桥路，它从院落门前的南堤街上横切而过，就在左前方留下一个车声人声鼎沸的十字路口，破坏了周围原本的清幽。不过一进入半掩的隆起一条条树筋的大门，里面静静的，一切喧闹似乎就突然间走远了。

株树楼建于清中期，坐北朝南，是一座二进合院式传统建筑。台门设于东南角，砖混结构，平面呈“一”字，门顶做成屋顶式，上铺筒瓦，瓦口施勾头滴水，门楣上略作砖雕装饰。台门构筑形式虽较简洁，但大门两壁柱墙面铺面采用了磨砖对缝法，这种做法是将砖的四边及露明部分加水磨光，使之角正边直，规格统一。砌筑完后，外面再用砖加水磨平，达到外观有缝而不见缝的效果。这是最讲究、最细致的一种砌筑法。

株树楼主楼系项傅霖藏书楼

主楼建筑因采用株树筑成，故名“株树楼”，是项傅霖的藏书楼。项傅霖（1798－1858），字叔雨，号几山，清道光二年（1822）举人，任富阳教谕，以学术风化为己任，振兴当地文化学风，人称“富阳君”。性好学，博览经史，旁涉天文、历学诸书。一生酷爱书籍，家有书籍数万卷，藏于株树楼，其藏之盛可与宁波天一阁相媲美，为当时瑞安最大的藏书楼。

项傅霖在外任职其间搜集到的古籍就收藏在株树楼，这里既是藏书楼又是他的书房。他治学严谨，平时不轻易下笔，下笔既成佳作。《几山笔记》的部分篇章即在这里产生。他将日常所见所闻所思都记载于《几山笔记》中，是一部包罗万象，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著作。

中堂作为主人的会客厅，是个书香盈屋的客厅，更像是他的精神领地，他在这里接待

半坡轩。清水式屋脊两端微翘，屋面铺设小青瓦，瓦口的勾滴残缺不全，裸露着瓦椽的端头，硬山造屋顶面饰饕耳封火墙面。月梁和斗拱上的朱红墨漆经岁月的腐蚀已大量斑驳脱落。

檐柱坐落位置与其他建筑的檐柱坐落位置有所不同，不立于阶条石内侧，而直接位于台明阶条石上。柱础采用两种材料做成，檐柱础用的是青石质靴状底方础，础面饰花卉浮雕，内柱均垫方木质柱础。檐柱的位置外移和木质的柱础，以及斗拱砍杀明显等，确定了建筑的悠久历史。

经过明间后上金柱间太师壁的侧门，进入二进天井，这里显得更幽静，用水冲洗过的花岗岩道坦反射出蛋黄色的光泽。天井中间用花岗岩条石铺设的甬道，连接着前后建筑。二进建筑呈对称布局，主楼为二层廊檐楼房，面阔五间，左右厢房各二间，进深二间，与前后厅连檐构筑。主楼和厢房都设有前廊，相互之间形成回廊。

来访的亲朋好友，一起探讨学术、评说时事。每当他搜集到珍稀善本，总是兴冲冲带回家与同样喜爱古籍的兄弟项舜、项傅梅一起研读，辨正校勘，遍施朱铅相与为乐。他们兄弟三人经常聚集在这里，在幽深的夜晚，彼此促膝长谈，切磋学问，研究探讨永嘉学派事功学说，然后在安静的夜里，意犹未尽地奋笔疾书，为清瑞安永嘉学派之复兴，为弘扬永嘉学派不遗余力。

瑞安先贤故事会 ②

姜立纲善书入宫廷

■马邦城

明英宗正统年间,瑞安梅头东溪村住着一户名叫姜秀山的人家。这一天,姜家好像遇上什么喜事,大摆筵宴,贺客盈门,好不热闹。原来,姜秀山的儿子,年仅七岁的姜立纲,因写得一手好字,经官府的推荐选拔,被朝廷破格录用为翰林院秀才了。

一个 7 岁孩童,年纪轻轻就能入选宫廷,谁不打心底里感到钦佩和羡慕啊! 酒宴结束后,在众人一片称赞声中,姜立纲登上一辆官府调用的华丽马车,由一名官员陪同,踏上前往京城的路程。

姜立纲对书法的喜爱,好像与生俱来,三四岁时,就能像模像样地“临池习字”了。不仅白天勤学苦练、乐此不疲,甚至连晚上还在灯下挥毫不息。父亲见儿子如此痴迷书法,便四处打听为他寻找名家指教。后来听说仙岩寺的觉禅和尚是位书法高手,就带着儿子前去拜访。

觉禅想试试小立纲究竟有多大能耐,便递给他一支毛笔,要他先写几个字看看。姜立纲也不推辞,大笔一挥,写下几个颇见功力的径尺大字。觉禅看后啧啧称奇,竖起拇指对姜秀山说:“令郎真是奇童,小小年纪就有如此高的天分,若能持之以恒,将来必成大器。”

他当即收立纲为徒,并教其临摹、研习同邑黄蒙(又名养正,明永乐年间书法家,其时官府榜署及国子监题名,大多出自他的手笔)的书法。

姜立纲聪颖好学,在师傅的悉心指导下,将那“台阁体”练得出神入化。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连朝廷都知道温州出了个善书的神童,7岁那年破格将他录为翰林秀才。尽管姜立纲跟觉禅和尚习字,尚无史实可考,也许只是个传说而已,但他 7 岁因善书入宫廷,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姜立纲擅长楷书,初学黄蒙,继而师法钟、王,后来自成一家。他的字体浑厚方正、清劲凝重,世称“台阁体”,亦称“诰敕体”,名倾天下。明朝天顺、成化、弘治三代,凡内廷制诰、官殿碑额,大都出于他的手笔。时人皆称其书为“姜字”,民间视若至宝,“人得片纸,争以为法”。姜立纲的墨迹珍贵、难得,其价格并不亚于祝枝山、王宠等书法名家,因此冒名顶替,临摹他的赝品也应运而生、层出不穷。明人话本《醉醒石》书中,就有过这样的记述,说成化年间,有一人专门摹仿姜立纲的书体,并冒用他的名字,出售“姜字墨宝”,骗取钱财,且屡屡得手。

不仅在国内,连海外都知道姜立纲的大名。有一次,日本国使者来到北京,向中国皇帝请求说:“我们日本国都新造了一座高达十三丈的大门,现想请贵国的书法大家姜立纲给写个匾额,望陛下能够恩准。”皇上觉得这是一件挺光彩的好事,当即诏令姜立纲代为书写。于是,那几个“姜字”随使者漂洋过海,最终高悬于日本京都的国门上,成为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日本国民很喜爱姜立纲的书法,夸奖道:“此中国惠我之至宝也!”

姜立纲除擅长楷书外,草书的造诣也极高。他的草书深得唐怀素之神髓,笔势流畅婉转,笔法潇洒秀逸、雅



马知力 画

健道媚。如他所写草书《李太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结法圆熟、挥洒自如,成为人见人爱的旷世珍品。

姜立纲一有闲暇,还喜欢呼朋引伴,到各地游历名山大川,从大自然中汲取艺术的营养和创作的灵感。每当遇到风光秀美的景致,他往往迷醉其间、乐而忘返。这一切对他的艺术造诣和风格形成,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次,他和友人云游归来,寄宿在一间临湖客舍中,友人请他书写“皆春”两字。面对眼前的湖光山色,姜立纲兴致盎然,立刻让人铺纸研墨。正提笔欲书之际,恰遇湖面有一船冲浪扬波飞驰而来。他似有所悟,将笔一挥,所书两字也成风波行舟之势,别有一番韵味,令朋友拍案叫绝、叹为观止。

还有一则与姜立纲相关的故事。据明代著名笔记体杂录《万历野获编》记载,嘉靖年间,当地有一谈相号木泉者,喜好书法,长期研习姜太仆立纲体。后来,他去京师谋生,正值世庙改造装修,因会书写一手出色的“姜字”,结果被斋官看上,竟大受恩宠当了官,后来一直做到工部左侍郎。仿效姜立纲的书体,还能有这般出息,可见作为“台阁体”的殿军人物,姜立纲是多么受世人的推崇,其书法之影响力又是多么巨大。

姜立纲一生经历明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五朝,从天顺七年 20 岁授中书舍人,到弘治四年累官至太仆寺卿,为官数十载,一向谦恭谨慎,清廉俭朴。史书上说他“位涉清华,布素如寒士;至于周急解纷,视弃金帛若尘土”,所以,深为朝野人士和乡梓戚友所敬重。弘治十二年(1499),他回乡奔丧,因悲伤过度而亡故,葬于白象金竹山(在今瓯海白象镇)。孝宗皇帝闻讯后,不胜悼惜,特遣浙江布政司使、温州知府邓淮前往谕祭,那篇祭文后被刻成石碑,迄今仍立于东溪村姜氏宗祠内。

历经 500 多年的风风雨雨,可惜姜立纲的墨迹已极少留存世间,除瑞安市文物馆藏一幅《李太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草书中匹和三方楷书墓志碑刻外,全国仅南京博物院藏行书《吟易诗》、故宫博物院藏楷书《七言律诗》等两件,弥足珍贵。然而尽管如此,从这几件仅存的墨宝中,人们仍可以领略“一代书宗”姜立纲,当年引领书坛的迷人风采。

人物名片

Rui an

姜立纲（1444—1499），字廷宪，号东溪，瑞安梅头东溪（今属龙湾海域）人，明代著名书法家。七岁以善书出名，选为翰林院秀才，后累官至太仆少卿。在任四十年间，朝廷圣旨、宫殿牌额，大都出自其手，日本京都国门上的大字，亦为他所书，被誉为“一代书宗”。